

稻作文化、信任模式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

黄景怡 米运生 张轶之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基于 CFPS 和 CHFS-SCAU 微观数据,本文实证检验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稻作文化促使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稻作区农户之间因为紧密合作而形成的特殊信任,有利于实现熟人间低成本的资源深度交换,从而使其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业缘分化、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从信任模式角度,本文为理解农户融资渠道偏好提供了新视角。据此,应充分利用特殊信任,扩充普遍信任,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促进正规信贷向农村地区渗透,创新贷款模式。

关键词:稻作文化;正规融资;非正规融资;特殊信任;普遍信任;融资成本

中图分类号:F30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25)02-0135-13

一、引言

非正规金融作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农户增收、农业发展等有着重要意义。总体来看,农户的资金来源更多地依赖于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民间金融,而不是基于制度信任的正规金融。《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2014)》显示,2008—2012 年间普通农户的民间借贷额在负债总额中的比重由 67%下降至 58%。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显示,2010—2020 年间农户年内累计借入款总额中民间借贷的占比由 60.41%上升至 63.49%。以上数据表明,尽管近年来农户的非正规金融占比有所变动,但始终超过 50%。非正规金融的旺盛生命力表明,其存在一定的内生性。比如,它与农业生产特征、农户风险特性相匹配,故能够满足农户对金融制度安排的内在需求^[1]。

经济史表明,正规金融体系发达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金

收稿日期:2024-10-1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乡村振兴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19ZDA115);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GD24WTCXGC07)

作者简介:黄景怡(1994—),女,广东阳江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生;
米运生(1972—),男,湖南溆浦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张轶之(1995—),女,江西上饶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本文通讯作者。

融产品的稀缺性特征制约了正规信贷的供给,农户便只能求助于替代性融资渠道,即非正规金融。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农户的融资规模较大且高度依赖制度信任的治理机制,民间金融的相对重要性较低,正规金融在农户经济活动中发挥相对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一规律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情况。我国南方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方^[2],但非正规金融发展呈现出“南盛于北”的格局。在浙江、广东等沿海发达省份,民间金融尤为活跃。显然,中国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呈现出不同于一般规律的特点,即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更依赖民间融资渠道。这一现象已经被人们观察到^{[3][4]}。农户融资渠道选择行为背后反映的是农户对不同融资渠道的偏好。根据文化经济(金融)学,文化具有塑造个体思维、偏好的功能,进而对个体金融活动参与行为产生长久、不易改变的影响。所以,农户融资渠道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悖论关系可能意味着,其不仅由收入、资产等短期的经济性因素所引起,文化等长期性因素在其中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信任模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治理机制,是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基础性、长期性因素。当农户在经济活动中产生资金需求时,特殊信任有利于减少道德风险问题,降低民间信用的交易成本^[5],进而强化了农户对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偏好。普遍信任则有利于农户降低对正规信贷的自我排斥程度,甚至主动寻求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帮助^[6]。于中国农民的融资渠道偏好而言,信任模式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中国是一个以稻麦为基本粮食种类的农业大国,种植传统决定了其在农民信任模式的形成中扮演着重要角色^{[7][8]}。依据秦岭—淮河一线,中国可划分为秦岭—淮河以南的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水田种植区和以北的以小麦为主要作物的旱地种植区。种植水稻的农户在农忙时期的协作互济以及共同修建灌溉系统过程中的协调配合,有利于强化基于亲缘和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从而形成了稻农熟人之间的特殊信任。而种植小麦的农户在农忙时期雇佣异地劳动力,拓展了交往半径,增加了与村庄外部陌生人的联系,形成了普遍信任^[8]。

进一步,结合稻、麦作区^①生产总值均值和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选择意愿的描述性统计(见图1和图2)可以发现:2014—2020年稻作区生产总值均值明显高于麦作区;同期,尽管较之于正规融资渠道,稻、麦作区农户均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但是稻作区农户的非正规融资偏好程度明显更高。对此,不禁要问:南北地区农户之所以有不同的融资渠道偏好,是否与种植文化相关?是否通过信任模式产生影响?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社会化服务市场兴起,种植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是否会随之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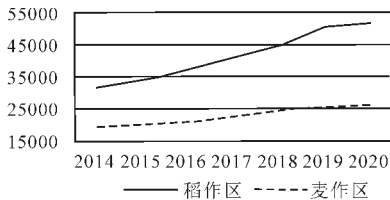


图1 稻、麦作区生产总值均值(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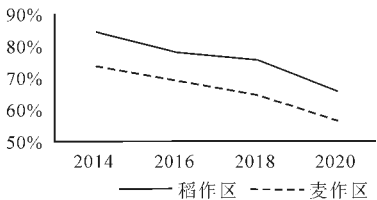


图2 稻、麦作区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选择意愿
数据来源:CFPS数据库。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作为农村金融制度安排效率的重要体现,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源泉。对此问题的考察,不仅有利于解开南北地区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理论之谜,而且对于如何发挥信任模式的优势、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提高金融支农的精准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首次从文化视角(稻作文化)出发,探究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形成的原因,丰富对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差异化根源的理解,拓展农户融资渠道选择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也拓展资本结构理论;第二,探讨了稻作文化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机理与路径,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农业种植传统、信任模式和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三,基于当前中国的现实背景,检验了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影响的稳定性,探讨稻作文化的影响是否会随着业缘分化和社会化服务市场发展,而发生根本性改变。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一) 稻作文化与信任模式

著名社会学家彼得·什托姆普卡认为,信任是相信他人未来的可能行动的赌博,是以他人在未来一些场合会如何表现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的^{[9](P33)}。信任的作用是面向未来的,但其形成过程是历史的。也就是说,信任并不是短时间内毫无接触形成的。相反,它建立于人们之间长时间的互动。如此,方能形成对他人未来行为的准确预判。对于中国农村居民的信任,费孝通(2013)认为传统农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世代居住在一起,互相之间交往频繁,建立起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延伸至地缘关系的社会信任结构即“差序结构”^{[10](P25-34)}。简言之,即农户较为信任那些血缘关系较近的群体。但是,农民内外边界是模糊且具有弹性的。除血缘关系外,他们还依据相互之间心理情感亲密认同的程度来决定信任程度^[11]。正如社会资本理论所假定的那样,人们与他人的联系将会增加对他人的信任,反过来也一样^[12]。所以,中国农村居民信任的群体,不仅包括有血缘关系的亲属,还包括不具有血缘关系但在长期农业生产活动中联系紧密的其他社会成员^[13]。在长期的生产过程中,由于不同作物所需的种植方式有所不同,农户与其他社会成员联系的紧密程度也存在差别^[7],使得农户形成了不同的信任模式。

水稻与小麦种植所需要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如水利设施与劳动力,存在数量与季节性的差异。“治稻者,蓄陂塘以潴之,置堤闸以止之,……又有作为畦埂。耕耙既熟,放水匀停,掷种于内。候苗生五六寸,拔而秧之,今江南皆用此法。苗高七八寸则耘之,耘毕放水焯之,欲秀复用水浸之。”^{[14](P108)}由此可以看出,种植水稻需要精心管理水分。对水分的精心管理离不开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修建需要以大规模协调一致的努力为条件,需要农户之间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15](P24-26)}。相比之下,小麦种植主要依靠天然降水以及井水。打井通常只需要一家一户的劳力加上几个帮工,在几天之内就可完成。灌溉井的使用和维护通常也只限于一家一户,不太依赖于农户间的协调与合作^{[16](P53-56)}。

种植水稻需要投入两倍于种植同等面积小麦的劳动力^[5]。水稻的种植需要精耕细作,从幼苗期、插秧期到灌浆期及日常的管理都离不开大量的劳动力。插秧、施肥以及收割时的生产劳作往往会在亲人和熟人的协助下完成。小麦的收割时间相当严格,在麦穗完全成熟的前两三天到完全成熟的当天收割完毕。因为,早则麦粒未饱,造成减产,晚则倒伏落穗,造成失收^[17]。相应地,小麦的种植对劳动力的需求呈现季节性特征,一般通过雇佣方式解决。由于不同省份之间小麦的成熟期不尽相同,所以部分处于农闲的农民为满足生存所需,成为跨省份的季节性流动农业工人即“麦客”^[18]。

相比之下,南方稻农在农忙时节的亲友互济,水利建设与维护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加强村庄内部成员之间的往来,逐渐形成了村庄内部成员和宗族成员之间信任度更高的封闭型社会。而小麦生产较短的播种期与收割期所形成的压力,诱致出劳动力异地雇佣与合作关系^②,增加了与陌生人交往的机会,因此发展出跨越血缘与地缘的普遍信任^[8]。可见,稻麦种植方式塑造了南北地区相异的文化,也构成了内嵌于稻麦文化中的差异化信任格局。具体地,稻作文化引致农户间的特殊信任。

(二) 信任模式与融资渠道偏好

根据资本结构理论,企业会权衡不同融资选择所产生的财务成本,以实现最优资本结构。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资金供给者难以准确评估企业新发行股票的价值,从而导致企业潜在股价下跌。在此情况下,企业应当选择其他融资工具,如内部融资或债务融资。所以,企业财务成本最小化的融资次序依次为内源融资、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19]。被卷入社会化分工体系之中的农户,在本质上无异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作为理性人,农户遵循收益最大化的原则合理配置资源^{[20](P29-41)}。更重要的是,作为理性人的农户也会调整资本结构,以实现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融资成本最小化^[21]。不同于(股份制)企业,作为普遍的小规模经营的农户,存在外源融资需求时,其资本结构调整主要在正规与非正规渠道之间权衡。

正如诺思(2008)所言,在社会选择过程中,由于个体拥有的有关其他个体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其在信息处理和利用时存在心智能力上的局限。这种内生于历史文化的信念和辨识环境时的不确定性相结合,共同决定了个体的选择集合^{[22](P51)}。农户在调整资本结构时,对于融资渠道的偏好,也不外乎如此。

更重要的是,对于特定社会群体而言,内生于历史文化的信念能够通过教育与模仿代代相传并趋于稳定,从而长期影响人们的偏好与行为决策^[23]。信任作为信念的重要表现形式,理应会对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来说,相比麦作区农户信任范围大且信任感较弱的普遍信任,稻作区农户因紧密合作而形成信任范围小且信任感较强烈的特殊信任,有助于持续地增进熟人间资源、信息的交流与互补,从而降低非正规融资的成本^③,使其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其中的作用机理具体分析如下。

首先,特殊信任有利于农户降低为获得非正规融资机会而产生的信息搜寻成本。熟人社会的特殊信任有助于稻作区农户快速地传递私人信息和复杂的隐性知识,比如农户的土地和农具等基本经济信息、家庭决策者的个人信息及农户家庭收成的历史信息。这降低了稻作区农户对村庄内部潜在资金供给者信息的搜寻成本。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网点多分布于城镇,与农户的地理距离较远。因而,对于稻作区农户而言,其收集正规金融机构的信息需要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远多于民间借贷。相比之下,普遍信任提供了农户与陌生人交流信息的意愿和动机,促进了其对多样化来源信息的接收^[24]。相比稻作区农户,麦作区农户搜集正规金融机构与村庄内部潜在资金供给者信息的成本差异较小。

其次,特殊信任有利于农户降低为达成非正规金融交易所产生的协商成本。每一种文化都存在信任边界,在边界之内的人比边界之外的人被认为更加值得信任^{[25](P23-32)}。当某种不可预见的事件(如契约中不能明确指定的事项)发生时,信任边界内交易双方对如何解决该事件更容易达成一致的意见^[26]。一般而言,农户受教育水平与金融素养较低,无法完全掌握金融交易合同的所有细节,同时缺乏对信贷需求者所受法律保护的高度理解。如此,农户是否信任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及信任程度,对于其申请贷款的行为决策尤为重要。在与商业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接触较少的情况下,对于贷款申请过程中涉及自身隐私的表格填写及复杂繁琐的合同签订,信任半径较短的稻区农户可能会较难理解,容易因与正规金融机构意见不合而反复沟通。而农户与亲友间发生的借贷活动是基于长期共同生产中频繁接触所形成的高度信任,双方之间可通过口头协议的日常性方式达成交易^[27],稻作区亦不外乎如此。即便农户求助于民间金融机构,也是更多地依赖于借贷双方私下的信任。这是因为民间借贷、互助会、钱庄、基金会等民间金融机构多根植于本地,为当地农户熟识之人发起,机构负责人可能是社区中的领导或者大姓家族的权威人物^[28]。相比之下,在长期小麦种植中形成普遍信任的农户,对于申请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顾虑较少,接触正规金融机构的意愿更强,也更容易与正规金融机构就交易内容达成一致意向。

最后,特殊信任有利于农户降低非正规金融交易合约的执行和事后监督成本。稻作区农户常常会面临一系列集体行动问题,比如谁来分担灌溉系统兴建与维护的成本,如何分配收益以及怎样监督各种行为。为防止搭便车行为,村庄内部自发形成了道德规范^[29]。在修建灌溉工程的过程中,稻作区农户世代之间基于道德规范的反复多次博弈,形成双方相互的特殊信任。所以,在南方传统乡村社会,稻作区农户群体内部之间的特殊信任所隐含的道德规范,使得交易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受到舆论、道德的抑制,从而对契约实施的结果具有更为确定的预期^[30]。这为出借方提供了稳定的心理预期,降低了借贷合约的执行和事后监督成本。相比之下,麦作区农户无需修建与维护灌溉系统,所面临的集体行动问题相对较少,所形成的地方性规范也相对薄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稻作文化促使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

假设 2:稻作文化促使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机制在于,其引致的特殊信任有利于熟人间实现低成本的资源深度交换。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 年截面数据。2014 年 CFPS 数据库的调查范围覆盖全国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498 个区县,样本规模达 13946 户,具有良

好的全国代表性及省级代表性。2014 年 CFPS 数据库调查内容涉及家庭层面的融资意向、家庭收入等和个人层面的健康、年龄、婚姻、职业等详细信息,为本文深入研究农户的融资偏好问题提供了良好的数据支持。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2014 年 CFPS 数据库没有提供农户所经营地块类型的相关数据,本文使用 2010 年的数据进行弥补。此做法具备一定合理性,因为地块类型依赖于当地的气候环境与地形条件,短时间内一般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所以本文使用 2010 年 CFPS 数据库中的家庭经营地块类型数据进行替代。为此,本文依据家庭样本编码,将 2010 年与 2014 年 CFPS 调查数据进行匹配,并选取了从事农业的家庭样本,在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1752 个。

2021—2022 年华南农业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开发的“普惠金融与三农研究”调研数据(以下简称为 CHFS-SCAU)^④也提供了农户经营耕地种植类型的详细数据,本应作为本文最理想的实证数据来源,但农户融资意向仅提供了 2021 年 7 月底的相关数据,有效农户样本仅 300 个左右。加之,一方面,尽管历史数据的时效性较弱,但其可以较好地保持事物变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文化更多地通过家庭成员代际传播,而非决定于环境特征,且对个体行为与决策产生长久的影响,具有稳定性。因而,本文以 2014 年 CFPS 数据作为基准回归、机制检验、异质性检验和部分稳健性检验的数据来源,采用 2021—2022 年 CHFS-SCAU 数据进行跨数据库的稳健性检验。

(二)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参考马晓青等(2012)的研究,本文根据 2014 年 CFPS 家庭经济调查问卷中的“首选借款对象”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定义农户融资渠道偏好^[31],将回答“银行”或者“非银行正规金融机构”的农户家庭定义为偏好正规融资渠道的样本,赋值为 0;将回答“亲戚”“朋友”或者“民间借贷机构和个人”的农户家庭定义为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的样本,并赋值为 1。

2.核心解释变量:稻作文化。结合现有研究,本文根据 2010 年 CFPS 家庭调查问卷中的“您家经营水田多少亩”的数据,计算“经营土地中水田面积的比例”以度量农户的稻作文化^{[7][32]}。

3.控制变量。尽管农户的决策多为家庭层面的联合决策,但户主在家庭的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决策中常常发挥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经济状况、社会资本和人口结构等方面的家庭特征,也会影响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所以,户主特征与家庭特征需要被考虑在内,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具体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说明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	亲戚朋友以及民间借贷机构和个人=1,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0	1752	0.752	0.432
核心解释变量	稻作文化	经营土地中水田面积的比例(%)	1752	23.110	37.672
	年龄	户主年龄	1752	44.726	11.844
	婚姻状况	户主婚姻状况:已婚=1,未婚=0	1752	0.952	0.214
	文化程度	户主受教育年限	1752	7.349	4.137
	性别	户主性别:男性=1,女性=0	1752	0.656	0.475
	健康状况	户主健康状况:健康=1,不健康=0	1752	0.885	0.319
	金融知识	户主金融知识:利率、通胀、风险识别分别设计 2 题,共 6 题,正确为 1,否则为 0,并累加分值	1752	0.260	0.850
	农业收入	家庭年农业收入自然对数	1752	6.620	4.219
控制变量	工资性收入	家庭年工资性收入自然对数	1752	6.690	4.946
	家庭现金存款	家庭现金与存款总额自然对数,存款包括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	1752	10.133	1.777
	金融产品持有	家庭是否持有股票、基金、信托等金融产品:是=1,否=0	1752	0.016	0.125
	家庭抚养比	14 岁以下 60 岁以上人数与劳动力人数的比值	1752	0.217	0.431
	房屋价值	家庭房产价值自然对数	1752	10.533	3.601
	人情礼支出	家庭年人情礼支出自然对数	1752	7.611	1.122
	交通通讯工具费用	家庭年交通通讯工具费用自然对数	1752	4.323	3.439

(三)模型设定

为验证待检验假设,本文构建如下 Probit 回归模型:

$$\text{Pr}(\text{bankcredit}_i=1)=\varphi(\alpha_0+\alpha_1\text{rice}_i+\alpha_2X_i+\lambda_i)$$
 (1)

式(1)中,i 表示第 i 个农户家庭,被解释变量 bankcredit_i 为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指标,bankcredit_i=0 表示农户更偏好正规融资渠道,bankcredit_i=1 表示农户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核心解释变量 rice_i 为农户的稻作文化指标,即经营土地中水田面积的比例。X_i 是控制变量,λ_i 是南北地区虚拟变量^⑤。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列(1)汇报了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估计结果表明,稻作文化变量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水田占比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农户对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偏好概率,验证了假设 1。

融资渠道偏好	稻作文化对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		
	(1) Probit	(2) 第一阶段	(3) IV-Probit
稻作文化	0.001 *** (0.000)		0.026 *** (0.004)
水稻种植适宜度		0.004 **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6.037 (11.991)	
样本量	1752	1752	1752
Pseudo R ²	0.028		
Wald chi2			137.93

注:表格中列(1)和(3)为边际效应估计结果,下文 IV-Probit 模型所汇报的估计结果也均为边际效应;括号内为聚类到村庄层面的标准误^⑥;***、** 和 * 分别表示 1%、5%和 10%的显著性水平,下表同。

(二)内生性检验

由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会受到风俗习惯等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所以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问题。与此同时,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也是对其可选择融资渠道的合理映射,可能会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尽管本文已经从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因素,但是模型仍可能存在遗漏其他重要变量的内生性问题,需进一步对其进行内生性检验。

参考现有相关文献^[8],本文利用 ArcGIS 软件获取来源于 Global Agro-Ecological Zones(GAEZ)数据库的农户所在省份水稻种植适宜度指数,将其作为稻作文化的工具变量。地区气候和土壤等自然禀赋条件与该地区农户的水稻种植情况高度相关。水稻种植适宜度越高,该地区农户种植水稻的可能性则越大,而农户个体的融资渠道偏好受水稻种植适宜度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选择水稻种植适宜度指数作为工具变量,符合相关性与排他性假设。回归结果如表 2 列(2)(3)所示,可以发现,在第一阶段回归中,工具变量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Anderson-Rubin Wald 检验的卡方值为 15.130,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25.983,同时 atanhrho_12 检验值为 0.075,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结果均表明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有效的。

相比表 2 列(1)汇报的 Probit 模型的边际效应(0.001),使用工具变量后 IV-Probit 模型回归的稻作文化边际效应估计系数(0.026)显然更大,说明忽略内生性的估计可能低估了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基于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本文主要汇报 IV-Probit 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参考丁从明等(2018)的研究,本文根据 2010 年 CFPS 家庭调查问

卷中“您家拥有/经营的土地类型”以及“您家种植的农林作物”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并进行回归检验^[8]。具体而言,本文将回答“水田”或者“水稻”的农户稻作文化变量赋值为1,将回答“旱地”或者“小麦”的农户赋值为0。如果农户同时拥有/经营两种类型的土地或者同时种植两种作物,则通过比对种植面积的大小确定农户的种植类型。如果水稻的种植面积更大,将该农户赋值为1,反之为0。回归结果如表3列(1)所示,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2.替换样本数据:基于2021—2022年CHFS-SCAU数据的再估计。为进一步保证上述结论的可靠性,本文使用2021—2022年CHFS-SCAU数据进行再检验。对于稻作文化的度量,根据CHFS-SCAU农业生产经营问卷中“这块耕地主要种植了哪些农作物”这一问题,将回答“水稻”的农户赋值为1,回答“小麦”的农户赋值为0。如果农户同时种植水稻和小麦两种作物,则按照农户是位于稻作区还是麦作区进行划分。若农户位于稻作区赋值为1,位于麦作区则赋值为0。对于融资渠道偏好的度量,根据CHFS-SCAU农业/工商业生产经营信贷和其他负债问卷中“您家计划从下列哪个渠道借入所需资金”这一问题,将回答“银行、信用社”的农户赋值为0,将回答“亲朋好友”“民间金融组织”等的农户赋值为1。其他控制变量设置与上文类似。回归结果如表3列(2)所示,在替换样本数据后,本文的主要结论依然成立。

3.可能的遗漏变量1:基于宏观经济因素的考虑。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农户的认知水平也有所不同,进而作用于其融资渠道偏好。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了解金融知识与信息的渠道更多,可能对正规金融机构的信任程度更高,也更愿意参与正规金融交易。水稻种植主要在南方,南方经济总体比北方活跃,水稻种植与民间融资渠道偏好之间的估计结果可能会因遗漏变量而出现偏误。

在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农户生产投资需求也相对旺盛,由此产生的资金需求难以从资金总量小的非正规融资渠道得到满足。这驱使其不断加深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政策的了解与认识,有助于纠正农户群体对正规金融机构信贷供给的认知偏差。为此,本文以各省份生产总值自然对数和农业产值占比分别度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方程中。回归结果如表4列(1)~(3)所示,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依然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

4.可能的遗漏变量2:基于农户融资需求特征的考虑。农户融资需求特征主要表现为融资需求期限和融资需求规模。第一,农业生产周期是农户融资需求期限的重要影响因素。相比跨年生产作物小麦,水稻生产周期较短,尤其是双季稻,稻农融资需求呈现时间短且灵活的特征。这不仅与非正规融资渠道的特点相适应,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稻作区非正规金融市场的繁荣与发展。第二,农户可能会因融资需求数量的差异而偏好不同融资渠道。一般而言,对比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私人借贷、非正规金融机构等所能提供的资金量较小,农户可能会根据自身资金需求量大小与融资渠道之间的适配程度而表现出对某一特定融资渠道的偏好。

为了检验在考虑农户融资需求特征后,稻作文化是否依然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产生影响,本文使用2021—2022年CHFS-SCAU农业/工商业生产经营信贷和其他负债问卷中“您家这笔生产经营民间借款的期限是多久”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农户生产经营的借款期限,根据“农户计划从相应融资渠道借入所需资金数额”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农户的计划融资量,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方程中。回归结果如表4列(4)~(6)所示,本文的主要结论不变。

表3 重新刻画核心解释变量及替换样本数据的估计

融资渠道偏好	(1)	(2)
	更换核心解释变量	替换样本
稻作文化	2.413 *** (0.563)	2.995 *** (0.2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276	278
Wald chi2	683.71	484.57

表 4	关于遗漏变量的讨论					
融资渠道偏好	(1)	(2)	(3)	(4)	(5)	(6)
稻作文化	0.017 * (0.010)	0.025 *** (0.004)	0.021 ** (0.008)	2.874 *** (0.458)	2.835 *** (0.476)	2.847 *** (0.475)
地区生产总值	0.363 *** (0.130)		0.215 (0.143)			
农业产值占比		- 0.053 ** (0.011)	- 0.045 *** (0.017)			
借款期限				- 0.001 (0.017)		- 0.009 (0.017)
计划融资量					- 0.000 (0.000)	- 0.000 (0.00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52	1752	1752	171	171	171
Wald chi2	91.12	216.18	144.70	211.60	205.66	213.20

5.基于秦岭—淮河分界线样本的再估计。在秦岭—淮河分界线两侧一定范围内,除农户主粮种植类型存在差异外,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等方面并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基于分布于秦岭—淮河分界线两侧的样本,可构造类似自然实验的数据结构,得到更加稳健与可靠的估计结果^[33]。参考洪炜杰和罗必良(2023)的研究,保留四川、甘肃、陕西、湖北、河南、安徽和江苏七个省份^[33],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稻作文化依然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偏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五、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根据上文理论分析,稻作区经营土地中更高的水田面积比例,增强了农户农业生产对亲友间互济的依赖程度,进而诱使其对熟人群体的信任程度更高。当农户出现融资需求时,其与熟人群体之间的特殊信任降低了民间借贷的融资成本,因而更倾向于求助信任程度较高的熟人群体。为验证这一假设,本文使用 2014 年 CFPS 成人调查问卷中的“一般来说,您认为大多数人是 可以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这一问题的回答来度量农户的信任半径,以划分农户的信任模式。若农户认为“大多数人可以信任”表示其信任半径相对较长,为普遍信任模式,并赋值为 1;若农户认为“越小心越好”则表示其信任半径较短,为特殊信任模式,并赋值为 0。稻作文化对信任模式的回归结果见表 6。可以发现,农户的稻作文化在 5%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其信任模式,表明在稻作文化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过程中,特殊信任发挥了中介效应。由此,假设 2 得以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可能因不同的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存在异质性。

1.基于农户经营规模的异质性分析。近年来,随着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农村出现了一批大规模转入土地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的农户。由于经营面积较大,规模

表 5 基于秦岭—淮河分界线样本的再估计

融资渠道偏好	(1)	(2)
稻作文化	0.016 *** (0.004)	0.025 *** (0.006)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样本量	688	688
Wald chi2	14.45	105.24

表 6 机制检验:信任模式

信任模式	(1)	(2)
稻作文化	- 0.005 ** (0.002)	- 0.015 ** (0.007)
控制变量	不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不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21	1721
Wald chi2	6.53	60.59

农户一般通过雇佣劳动力来完成农业生产和改进灌溉设施,这使其与其他农户之间的生产性合作紧密程度有所下降。与此同时,规模农户通常具有年轻化、较高的人力资本等特征,利用现代通讯工具获取正规信贷信息的能力更强。不同于以消费性信贷需求为主的传统农户,规模农户一般以生产资料购买、劳动力雇佣以及机械配置等生产性信贷需求为主,尤其是大规模农户。而相比消费性信贷需求,生产性信贷需求较难从非正规融资渠道得到满足。为考察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稻作文化对其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参考已有研究^[34]和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耕地统计口径,本文以经营规模是否小于10亩为标准,划分出小农户和规模农户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7列(1)(2)所示。

2.基于农户收入水平的异质性分析。家庭收入高的农户在抵押担保和资信能力方面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认可。正规金融机构本身具有“嫌贫爱富”的特征,其目标客户一般为收入偏高的农户群体。农户获得信贷可能性的增加提高了其外源融资积极性,因而家庭收入较高的农户可能更倾向于选择正规融资渠道。为考察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稻作文化对其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以农户家庭总收入1/4和3/4分位数为标准,划分出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农户家庭进行分组检验,结果如表7列(3)~(5)所示。

根据表7可以发现,稻作文化均正向显著影响了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农户的稻作文化的估计系数差异较小,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相关模型SUR检验对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的组间系数差异进行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这说明,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在不同经营规模和收入水平农户间无显著差异。

融资渠道偏好	异质性分析:不同经营规模与收入水平				
	经营规模		收入水平		
	(1)	(2)	(3)	(4)	(5)
	小农户	规模农户	低	中等	高
稻作文化	0.027 *** (0.004)	0.029 *** (0.007)	0.035 *** (0.005)	0.025 *** (0.005)	0.027 *** (0.0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270	482	129	843	767
Wald chi2	163.78	90.74	163.25	124.42	131.46
SUR 检验 P 值	0.741		0.101	0.674	0.184

注:本文对三组回归的组间系数差异性进行两两检验。其中,列(3)中的SUR检验P值对应列(3)与列(4)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列(4)对应列(4)与列(5)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列(5)对应列(5)与列(3)的组间系数差异性检验。

六、拓展性分析

(一)农户业缘分化、稻作文化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

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诱发了原本高度同质化农户的职业分化,农民的社会网络也得以拓展。这使得农户可获得的金融信息量大幅增加,提高了农户参与正规金融交易的积极性。与此同时,非农收入较务农收入高,收入提高后农户的抵押担保和资信能力等也更容易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认可。然而,这些并不意味着农户的融资渠道偏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究其原因在于,主粮种植类型衍生出的地区间差异化的信任模式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具有相对稳定性与不易改变的特点。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中融贯的任意性原则^[35],农户在与他人协作过程中促进了相互之间的联系与信任,确立了特定借贷对象偏好。这些偏好随着农户之间长时间的正式与非正式经济互助活动的开展,逐步变得清晰,甚至在代代相传中得到强化,绵延至今^[36]。

具体地,农户的非农就业可细分为本地务工和外出务工两种类型。一般而言,外出务工可选择的

就业范围更广,就业机会也相应更多,大量农民外出务工以提高收入。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外出务工人员的亲友仍留在农村,他们之间的人情交换可表现为农村亲友提供生产和生活帮扶,外出务工人员则进行农地的免费流转。这可能使得种植水稻的村民之间的生产联系更为紧密,双方之间的信任不断加深。此外,根据《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2005)》,农民外出务工主要依托于以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社会信息网络,88%的农民工外出是通过亲友帮带和介绍的^[37]。由此,农民工进城后往往相聚而居,形成了人们所熟知的北京“浙江村”、广州“湖北村”、深圳“湖南村”等现象^[38]。所以,外出务工的农民以亲友结伴的形式流入相同的区域,交往对象也多局限于老乡和亲友圈子范围,融资渠道偏好也不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为探究农户业缘分化是否会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本文使用农户非农人数占家庭总人口数量的比重,来度量农户业缘分化程度。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农户业缘分化程度与稻作文化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8列(1)所示。可以发现,农户业缘分化与稻作文化的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这表明,我国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农户业缘分化并没有弱化稻作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

(二)社会化服务、稻作文化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不断发育、农村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农户会通过购买生产性服务替代自身劳动投入,以节省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从表面上看,这可能会降低在水稻生产过程中,稻作区农户之间互助共济、协调合作的程度,进而缩小稻农之间、麦农之间的生产性合作差异。实际上,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的发育只是改变了农户间生产合作的表现形式,即由互惠性合作转变为商业性服务,并没有明显改变农户之间生产性协作的紧密程度。这是因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发展需要与当地乡村正式或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制度相适应。在长期农业生产过程中,因不同的主粮种植类型,南北方衍生出特征迥异的地区文化。不同于麦作区农户,稻作区农户的社会互动和合作对象可能更倾向于熟人网络中的成员。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集中于产中服务环节,尤其是机械收割服务,南方稻区为小范围的、多中心的农机本地作业服务市场,北方麦区则更多为跨区作业。

为进一步探究社会化服务是否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一方面,使用2014年CFPS家庭调查问卷中“雇工费”以及“机器租赁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分别构建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和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支出两个指标,来度量农户使用社会化服务情况。其中,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为二元变量,即农户是否购买社会化服务;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支出则是对农户社会化服务投入水平的细化表征,为雇工费与机器租赁费之和。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稻作文化与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的交互项、稻作文化与农户购买社会化服务的支出的交互项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具体实证结果如表8列(2)(3)所示。另一方面,参考黄玖立等(2023)、刘启超和王亚华(2024)的研究,使用来源于《1957年各省(市、区)农作物面积及产量分县统计资料汇编》的1957年各省份水稻播种面积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比重来重新度量稻作文化^{[39][40]},与2021—2022年CHFS—SCAU数据库中农户家庭和户主特征情况相匹配。这是因为,在1957年这一时间节点上,中国农业机械化进程尚处于起步阶段,同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使得农户对社会化服务缺乏需求。而“社会化服务”一词也是在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及。随后,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日益受到重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因此,在当前社会化服务市场不断发育的背景下,采用稻麦种植的历史数据可以有效地排除社会化服务对农户种植行为的影响,更好地探究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具体实证结果如表8列(4)所示。

由表8列(2)(3)可知,农户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和购买社会化服务支出与稻作文化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由列(4)可知,即使在排除社会化服务的影响后,稻作文化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影响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些结果均表明,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

表 8	拓展性分析：业缘分化与社会化服务			
融资渠道偏好	(1)	(2)	(3)	(4)
稻作文化	0.027 *** (0.460)	0.030 *** (0.009)	0.018 (0.013)	0.026 *** (0.005)
农户业缘分化	0.403 * (0.218)			
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		- 0.001 (0.171)		
购买社会化服务支出			- 0.238 (0.303)	
稻作文化×农户业缘分化	- 0.006 (0.008)			
稻作文化×参与社会化服务程度		- 0.008 (0.007)		
稻作文化×购买社会化服务支出			0.046 (0.07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752	1262	1262	1642
Wald chi2	157.00	86.56	89.71	272.90

七、结论与建议

农户融资渠道偏好是农村金融制度安排的重要考量内容。若制度安排与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不契合，农村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供求则难以实现平衡。总体而言，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高于北方地区，但相比北方地区种植小麦的农户，南方地区种植水稻的农户更偏好民间融资渠道，而非银行、信用社等正规融资渠道。稻作区农户对于民间融资渠道的偏好，更多的是出于主观的倾向与选择。其中的深层次原因值得深思。本文从理论层面梳理了稻作文化影响农户融资渠道偏好的内在机理，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稻作文化显著提升了农户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的主观意愿。水稻种植农户之间的特殊信任，有利于实现低成本的资源深度交换，从而使其更偏好非正规融资渠道。进一步讨论发现，业缘分化、社会化服务并没有改变稻作文化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渠道偏好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以融资成本为切入点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对于稻作区农户而言，作为贷款需求者，其应当积极拓宽和提高正规信贷信息获取渠道及效率，可以通过向成功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询问贷款经验，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合作联合贷款等方式，促进自身与正规金融机构间信任关系的构建与深化，帮助双方实现信息的传递和分歧的解决，以降低正规信贷信息的搜寻成本和交易达成前的协商成本。第二，对于正规金融机构而言，作为贷款供给者，其应当针对稻农信任半径较短的特征，加大向稻农宣传相关信贷产品（服务）与信贷政策的力度，比如进村入户、面对面解答等，以及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和现代信息通讯手段，建立正规信贷信息发布平台，为稻农提供金融信息和相关咨询服务，增进稻农对贷款条件及申请流程的了解，从而降低稻农的事前信息搜寻成本以及协商成本。第三，对于政府而言，在一些正规金融发展较滞后的稻作地区，政府可以充分发挥稻作文化在信息传递方面的积极作用，引导正规金融机构与村庄能人、村干部或民间中介等农村社会网络的关键节点实现各种形式的信息联结，提升正规金融机构捕捉稻农信息的能力，推动统一（信息）大市场的形成，创新贷款模式，进而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信贷合约执行成本和对稻农的事后监督成本。

注释：

①除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外，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划分我国主要粮食种植区域，秦岭—淮河以北是以小麦为主要作物的旱地种植区，以南则是以水稻为主的水田种植区。但因秦岭—淮河线横跨多个省份，所以以水田面积与水田和旱地面积之和的比值为基准划分这些省份，若该省份水田面积占比超过 50%，则其属于稻作区；否则，属于麦作区。其中，水田和旱地的面积来源于国土调查成果共享应用服务平台，<https://gtdc.mnr.gov.cn/shareportal#/>。

②水稻的种植周期短于小麦，尤其是双季稻。这可能使得相比麦农，稻农之间的合作时长明显较短。然而，在南方双季水稻种植过程中，稻农之间需要换工、统筹安排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这也称为“双抢”现象。所以，由“双抢”现象便可窥见，种植双季稻的农

户对彼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需求更高。

③非正规融资的成本由利息和交易成本两部分构成,利息是指借款所需要偿还的利息,交易成本则主要包括信息搜寻成本、协商成本和监督成本等。

④2021—2022年CHFS—SCAU数据库来自全国性抽样调查,采用三阶段、分层PPS抽样办法。第一阶段采用分层人口规模比例概率(PPS)抽样方法随机抽取区县,第二阶段在区县内抽取社区,第三阶段在社区内随机抽取住户。调查覆盖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69个区县、1028个社区(村),样本规模达22027户。

⑤由于水稻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可能会存在南方地区的其他特性而非稻作文化本身对农户融资渠道偏好产生影响,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所导致的估计偏误,需要控制南北地区变量。秦岭—淮河分界线是目前相对公认的中国南北分界线,其能够显著区分南北地区在经济发展、社会文化、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本文以秦岭—淮河为分界线区分南北地区。

⑥由于水稻种植过程中灌溉合作以及灌溉系统修建一般以村为单位,且村落之间并不密集,较为零散,所以稻农之间的合作更多地局限于村庄内部成员之间,其融资渠道偏好也具有较强的聚类效应。另一方面,同一村庄内农户的融资偏好可能会相互影响,在现实中,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关系较为亲密的农户,不仅融资渠道偏好一致,而且首选融资对象也相同。基于以上两方面的考虑,本文使用聚类到村庄一级的稳健标准误。

参考文献:

- [1] 姜旭朝,丁昌锋.民间金融理论分析:范畴、比较与制度变迁[J].金融研究,2004(8):100—111.
- [2] 丁任重,王河欢.城市群经济差异、产业结构与南北经济分化[J].财贸经济,2022(12):128—143.
- [3] 王曙光,王东宾.双重二元金融结构、农户信贷需求与农村金融改革——基于11省14县市的田野调查[J].财贸经济,2011(5):38—44.
- [4] 高晶晶,史清华.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农户金融行为变迁——以浙江十村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23(2):89—106.
- [5] 张博,孙涛.稻麦人所食南北竟谁分:金融组织区域发展差异的历史起源[J].经济学(季刊),2023(1):353—370.
- [6] 何婧,岳靓.“不能”还是“不愿”?非认知能力对农户信贷排斥的影响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1(3):95—106.
- [7] Talhelm, T., Zhang, X., Oishi, S., et al. Large-Scale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within China Explained by Rice versus Wheat Agriculture[J]. Science, 2014, 344(6184): 603—608.
- [8] 丁从明,周颖,梁甄桥.南稻北麦、协作与信任的经验研究[J].经济学(季刊),2018(2):579—608.
- [9] [波兰]彼得·什托姆普卡.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M].北京:中华书局,2005.
- [10]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 [11] 李伟民,梁玉成.特殊信任与普遍信任:中国人信任的结构与特征[J].社会学研究,2002(3):11—22.
- [12] Putnam, R. D. Tuning in, Tuning out: The Strange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Capital in America[J].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1995, 28(4): 664—683.
- [13] 展进涛,沈婷,俞建飞.技术进步影响农村的内部信任了吗?——基于农业机械技术与互联网技术的考量[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84—90.
- [14] 王祯.王祯农书[M].北京:农业出版社,1981.
- [15]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城邦与世界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 [16]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17] 史建云.浅述近代华北平原的农业劳动力市场[J].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4):78—85.
- [18] 陈正谟.各省农工雇佣习惯的调查报告[C]//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1934:330—369.
- [19] Myers, S. C., Majluf, N. S. Corporate Financing and Investment Decisions when Firms Have Information that Investors Do Not Have[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984, 13(2): 187—221.
- [20] 西奥多·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 [21] 王家兴,米运生,薛钊杰,等.中国家庭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报告(2017—2021年)——全面推进、区域协调与群体差距收敛[J].金融经济研究,2024(6):35—48.
- [22]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 [23] Guiso, L., Sapienza, P., Zingales, L. Does Culture Affect Economic Outcomes? [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6, 20(2): 23—48.
- [24] 高静,张应良.农户创业:初始社会资本影响创业者机会识别行为研究——基于518份农户创业调查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13(1):32—39.
- [25] Fukuyama, F. Trust: The Social Virtues and the Creation of Prosperity[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5.
- [26] 刘凤委,李琳,薛云奎.信任、交易成本与商业信用模式[J].经济研究,2009(8):60—72.

[27] 彭澎.市场不完全下商业信用对银行信用和民间信用的替代机制——来自农资赊购的经验证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6):129—138.

[28] 农村金融研究课题组.农民金融需求及金融服务供给[J].中国农村经济,2000(7):55—62.

[2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龙虎.社会资本:流行的狂热抑或基本的概念? [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3(2):26—34.

[30] 张敦力,李四海.社会信任、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会计研究,2012(8):17—24.

[31] 马晓青,刘莉亚,胡乃红,等.信贷需求与融资渠道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2(5):65—76

[32] 罗必良,耿鹏鹏.“稻米理论”:集体主义及其经济解理[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1—12.

[33] 洪伟杰,罗必良.种出来的制度:水稻种植、集体行动与地权稳定性[J].南方经济,2023(7):1—20.

[34] 陈锐,蒋维扬,钟真.中国农业劳动相对价格变动对农业服务业化的影响[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4(9):33—52.

[35] Ariely, D., Loewenstein, G., Prelec, D. "Coherent arbitrariness": Stable Demand Curves without Stable Preferences[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 118(1): 73—106.

[36] 王姝彦,郭虹.认知演化的文化可塑性——基于文化神经科学视角的分析[J].浙江学刊,2023(5):73—79.

[37] 胡金华,陈丽华,应瑞瑶.农村劳动力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10(8):73—79.

[38] 刘启超.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研究[J].经济科学,2020(2):101—115.

[39] 黄玖立,张玉书,吴敏,等.种植结构与短半径合作——来自合伙制企业的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3(11):18—38.

[40] 刘启超,王亚华.稻作文化对农民工同乡聚居的影响——基于社会网络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24(8):107—124.

Rice Culture, Trust Models and Farming Households' Financing Channel Preferences

HUANG Jingyi MI Yunsheng ZHANG Yizhi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CFPS and CHFS-SCAU microdata,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rice culture on farming households' financing channel preference and its underlying mechanism. It is found that rice culture contributes to farming households' preference for informal channel financing.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the conclusion still holds. The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articularized trust between farmers in the rice farming area due to close cooperation facilitates the realization of low-cost and deep exchange of resources, which leads to a preference for informal financing channels. Extended analysis finds that non-agriculturalization and socialized services do not change the effect of rice culture on farming households' informal financing channel prefer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ust model, this paper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understanding farming households' financing channel preferences. In this regard, it is crucial to leverage specific trust to expand general trust,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in financial dealings, facilitate the penetration of formal credit into rural areas, and innovate loan models.

Key words: Rice Culture; Formal Financing; Informal Financing; Particularized Trust; Generalized Trust; Financing Cost

(责任编辑:易会文)